

第二届中欧论坛 - 全体大会

2007年10月6日

乔治·贝尔图安 (*George Berthoin*)

让·莫内办公室前主任, 中欧论坛创始人

-- 全体发言 --

大使女士阁下, 我很想讲中文, 但我的口音不太好。所以我要讲当地语言, 法语。既然您刚才讲了一个故事, 我也想讲一个。在我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驻英国代表团团长期间, 我决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当时是 1971 年。由于欧洲共同体与中国尚未建交, 我请求对外关系委员拉尔夫·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批准我前往。他很犹豫, 最后向我做出了书面指示: “您可以冒个人风险和危险赴华访问。” 您可以看出, 我们走过了许多道路。于是, 我前往拜会中国驻欧洲共同体临时代办。在那里, 我受到了一系列人士的接待, 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本小红皮书。我记得每上一层台阶就有两个人挥动着红皮书。最后我到了临时代办办公室。会谈用英语进行, 我以为会很短。最后持续了五个半小时。这是双方第一次进行交流, 所有的内容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却成为现实。令我感到自豪的是, 我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首次建立了联系。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有时冒个人风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想跟您说的第二件事是, 这次会晤使我回忆起 1952 年开始创立欧洲共同体的情形。当时是一片绝对混乱。所以, 如果没有完全遵守时间表, 您不必担心。因此, 混乱成就了欧洲共同体的创立。我相信, 如果有时我们感到有一点无序, 这表明将建立未来新秩序。

(...)

我想您也了解我们认同的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一般来讲, 这一转变以和平方式进行, 但它比各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和革命都走得更远。我想重复欧洲与会者向中国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同时就中国与会者讲的几个问题提两点意见。全球化是对某种美国文化霸权的肯定吗? 1950 年在欧洲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种看法, 历史学家可能对此有争议, 但作为政治生活的实践者, 我们从中做出了一定数量的结论。这一看法直接与中国有关。19 世纪是欧洲社

会转变最激烈的时期。当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有三种可能的反应。第一种：力图推翻压迫人的制度。第二种是迁往别处。第三种就是顺从。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最初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是因无法忍受生活条件而逃离欧洲的欧洲人。因此，欧洲向美洲移民是一种革命现象。美洲曾经建立在遭受压迫的欧洲人的梦想基础上。随后，爆发了革命。大量移民特别是中国人突然涌入美洲，修建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强行送往美国的非洲人受到压迫和奴役，但美国最初的政治实质是畅想更美好未来的欧洲人的政治实质。与此同时，在欧洲，留下的人进行了反抗，发动了革命，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民主革命。这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直接影响。中国有时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如1911年，有时受到共产革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的社会都曾受到震动，每次都我们将我们向现代化更推进一步。

美国霸权不是美国的。美国霸权是我们各国社会进行现代化尝试的霸权。二战结束之后，当我们开始进行尝试的时候，我们势单力薄。欧洲革命期间，我们曾想让美利坚合众国的欧洲梦想重返欧洲，力图组建欧罗巴合众国。因此，尽管美国政治与欧洲政治差别重大，但它们都是曾经追寻人类进步的同一个家庭的两分子。总之，如果说人类进步基金会是这次会议的建筑师，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存在好几个原因。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将这一想法再次引入欧洲：我们不再是敌人，成为敌人毫无益处。于是，我们怀着耐心（因为在生活中无论做什么都非常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成功地（布鲁塞尔可作为见证）使原来相互敌视、相互残杀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努力。结果是，欧盟的成功可能重新引入多样性。每逢战争时期，多样性就会消失。每逢平时时期，多样性即变为可能。因此，在欧洲，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不认为全球化是消除多样性的一种手段，相反，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管理。我们准备与全世界各方建立保持联系，这使多样性得以发展，而非相反情况。如果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的启发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功地使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归属于中国因素的共同爱国主义中生存在一起。我们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在欧洲，我们开始适应中国的群体现象，因为你们第一次听到欧洲人说：“我们拥有5亿人口”。以前，我们说：“我们拥有1千万人口，5千万人口，6千万人口”，当时我们的心理只适应这些小数字。我们正在发现，5亿使我们处于大阵营之列，他们正在形成21世纪的未来人类。因此，我们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这个13亿人口的体系如何运作。我们好奇地想知道这一庞大人类群体的爱国主义内容是什么。我们好奇地想知道几千年来存在过哪些价值以及哪些价值仍在启发当今中国社会。我们非常好奇地想知道，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你们如何遭受一系列的影响、纷争、悲剧和希望；今天你们如何成功地在几年间利用力量和尊严融入世界大舞台，某些欧洲人就此提出一些问题。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想知道的是，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从结果上来讲是否与中国文化相一致。只要受过最起码的教育，我们所有人都会记得美妙的中国绘画和高质量的瓷器、中国画及音乐。这种现代经济入侵是否与中国文化相符？它有可能摧毁中国文化吗？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另一个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想知道你们中国人在融入国际社会时，是否了解国际准则，是否准备接受它们。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进行过多次探讨，有时会这样回答我：你们所说的准则不是我们已经建立的准则。这是你们自己建立的准则，对此我的回应是：你们中国人准备创建治理全球的新准则吗？换言之，你们中国人希望参与这一全球治理的建立吗？

我观察到一个事实。在历史上，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超级强国。过去，我们去北京。我们恭恭敬敬地向皇帝鞠躬。今天，情况不是这样了。我们去北京，去华盛

顿，去布鲁塞尔，去莫斯科，换言之，不再有世界中心。尽管中国曾经自认为世界中心，现在它已经不是了。我们都是世界的中心。我记得在北京观看从月球上拍摄的第一张地球照片时进行的一次会谈，我的中国朋友，一位著名学者，对我说：“您看，从这张照片开始，中国文化和中国敏感性将会改变”。

国际准则的另外一点，这个已经提出过的问题是本次会议的一个次要问题：中国公民社会对政治当局有何影响？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外国人不应回答。中国人也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人内部才能做出回答。但很明显的是，你们所听到的，比如我们自我组织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在混乱和无法预测时所采用的方式，可以成为中国化的思考内容。有个事实使我感到震惊，就是我们所听到的中国人的出色发言是临时准备的，因为大多数发言者在开始前十分钟都不知道他们要发言。正如我们所听到的，这种反应的本能发自内心深处，这一演变内容可使中国多样性表现出丰富性和强大性。提出的问题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当局之间的关系，我再重复一遍，不应由欧洲人来回答。我曾经与几位朋友一起有幸于 1981 年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我认为理解中国化的中国当局以谨慎、谦逊和耐心的方式希望逐渐实现中国式发展；我们在经济领域所清楚看到的。最后，向中国人、欧洲人、美国人及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准备加入被视作普遍的原则吗？我接受过纯正的法语教育，我对这一普遍价值观表示怀疑。我上小学时，学校教育我说法国负有全球使命。很久以前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时，他对我说学校让他重复说：“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他对我说：“我有几点疑问”。普遍价值观是一种应该更好地定义、更好地保存的概念。至于我，就在这时我才想知道中国是否确实准备加入被视作普遍的原则。对我而言，第一个问题是要知道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我们是否有能力尊重其他人，但不是以礼仪和表面的方式来尊重，而是深入地尊重他本人。这就要求我们要么从集体方面要么从个体方面认为我们遇到的个人与其他个人是平等的，他的自尊和生活应该受到尊重。

另一点：我非常喜欢结交中国朋友，因为在中国人们仍然尊重老年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感到无拘无束。我在全世界各地旅行时与最谦虚的人、革命人士、政府领导、学者、艺术家及戏剧人士交谈，我发现存在一种共同的普遍直觉，但各自历史和故事的不同使我们相信我们相互之间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同的。我们正在通过根本挑战重新发现我们彼此之间很遥远。负责人提醒我注意时间，我现在就结束发言，但我将话题展开的意图是重提在发给我的材料中所出现的几个欧洲问题，以引导欧洲与会者做出反应，向中国与会者提问。为使皮埃尔·卡蓝默先生放心，我将放弃日程中为我在后面安排的半个小时，以留时间给欧洲与会者提问发言。